

蔡元培体育思想研究

罗时铭¹, 苏肖晴²

(1.苏州大学 体育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21; 2.福建警察学院 科研处,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 对蔡元培的体育思想进行了归纳与整理。蔡元培的体育思想不仅有着较为丰富的内容, 而且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一体系中, 强调三育并重, 坚持全面发展, 是其体育思想的核心; 倡导军国民体育, 注重体育的社会功能和作用, 是其体育思想时代特征; 在充分肯定体育运动对人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的同时, 又反复强调学校体育要以普及为原则, 是其体育思想的基本态度。

关 键 词: 蔡元培; 体育思想; 军国民体育; 三育并重

中图分类号: G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08)07-0028-05

Study of CAI Pei-yuan's physical education ideology

LUO Shi-ming¹, SU Xiao-qing²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21, China;

2.Research Department, Fujian Police College,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s summarized and sorted CAI Pei-yuan's physical education ideology. CAI Pei-yuan's physical education ideology not only contains various contents, but also has formed a complete theoretical system. In this system, emphasizing equally important triple education and adhering to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re its ideological core; advocating military, national and civilia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valuing social functions and roles of physical education are its sports time characteristics; repeatedly emphasizing the principle for scholastic physical education to be popularized while fully affirming that sports will have a positive a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is its basic attitude toward phys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CAI Pei-yuan; physical education ideology; military national and civilian physical education; equally important triple education

蔡元培(1868-1940年),字鹤卿,号子民,浙江绍兴人。蔡元培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动荡激烈、变化多端的时代。他经历过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抗日战争等帝国主义列强侵华战争的时代;经历过清王朝、北洋军阀以至国民党统治的时代;经历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政治急剧变革的时代。因此在思想领域,曾面临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不同社会制度、思想文化的冲突。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中,蔡元培经受了严酷的历史考验,一生追随光明、进步,始终站在时代潮流前面,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先驱者之一。以翰林身份参加革命,并一生坚持进步,在中国历史上仅他一人^[1]。蔡元培既

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又是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一生是在为民族解放和捍卫民权的奋斗中度过的,同时也为中国近代教育与科学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成就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的作用。蔡元培体育思想是他从事革命、学术与教育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所表现出的阶段性发展特征,成为近代中国人体育价值观念演变的缩影。

1 军国民体育思想

中国的军国民体育思想主要发生在清末民初历史时期内,并在民国初期形成高潮。中国人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接受军国民主义的,因此不同阶级和人群在

提倡军国民主义的时候，其动机和目的是不一样的。辛亥革命前，蔡元培鉴于民主革命的需要，曾竭力主张实行军国民教育，提出学堂的任务就是保国强种。“今天下志士，所抵掌奋谭，为保国强种之本者，非学堂也哉。”^{[2]90}认为“中国所以以四万万之众，而亟见侮于外国，以酿成亡国亡种之祸者。”^{[2]94}因而在他1901年的《学堂教科论》中，已有设置体育课程的设想。“嬉游体操，为卫生而设，生理学之支也，故附于理学。”^{[2]150}并在他任南洋公学特教班总教习时(1901年)，开始付诸行动。不仅有时间的规定，而且有场地的要求。“学生游息虽有一定之时，然须有一定之地。如抛球、竞走等事，只准在体操场为之；其因雨、因寒不得至体操场，则只能于饭厅游廊等处游步，不可结队跳舞，以妨他人。”^{[2]155}在1902年制订的《爱国学社章程》中，他亦明确要求各年级安排体操课，以“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2]166}

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虽“在他国已有道消之兆，然在我国，则强邻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所以他说：“所谓军国民教育者，诚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也。”^{[3]130}指出“当民国成立之始，而教育家欲尽此任务，不外乎五种主义。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是也。”^{[3]263}认为“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那么，什么是军国民？蔡元培的解释是：“军国民主义者，筋骨也，用以自卫。”所以无论是中国古代六艺之射御，还是古希腊体操，均为军国民主义。“军国民主义”就是“体育”。更具体地说，学校“兵式体操，军国民主义也；普通体操，则兼美育与军国民主义二者。”^{[3]135}

蔡元培的军国民体育思想不仅反映在学校教育中，亦反映在社会活动中。例如在他1915年起草的《华人御侮会》中，特别指出会员有责任“了解各种体育之方法，而择其相当者实习之。”要求能“了解各种个人应用之武器，而择其相当者备豫之(匕首、炸弹、手枪、毒物等等)。养成抑强扶弱之习惯，力持可杀不可辱之气节。见有敌人侮我同胞者，击之，事变如有株连，则挺身任之。”^{[3]387}他指出：“要复兴民族，第一步是设法使大家的身体强健起来。”而“提倡体育是一个改进民族的很好的办法。”他说：“日本人提倡体育，很有进步，就影响到了全体民族。所以，我们不能不认识到，体育乃是增加身体的健康，同时谋民族的健康，而非为出风头。”^[4]他特别强调“战争以军人为主体”，故“为军人者，俱能奋勇前进。”^{[5]2}其军国民教育就是“重在整齐、严肃，尤在服从。”^{[5]281}他说：“军国民教育的主旨是整齐严肃，绝对服从。此种主义常

用军法嘱望学生具有这种精神，并用尊崇皇室的道德，加以激发。”^{[5]335}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整个中国社会对军国民教育有所反思，蔡元培对体育的认识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受军国民体育思想的影响，在蔡元培身上还远未结束。例如1923年，他曾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接受采访时说：“惟中国社会毫无组织，民众势力犹如散沙，非有长期间‘教育训练’恐难有望。余极不满今之青年口谈革命而不务实力，且借口于志在革命而抛荒学业，其结果，革命未成，而自身先已堕落，此则余所反对者也。”他认为：“中国教育应重尚武，不但为保卫国家计，亦为强身健体计。”他说：“余上次由欧返国，曾在北大提倡‘学生军’，即是此意。”所以“余之主张，各学校应一律提倡体育，国民身体既强，临时授以‘军事知识’，亦可执干戈以卫国家。此则余对于教育前途之意见也。”^{[6]339}在这里，尤需我们注意的是，社会长期动荡不安的客观环境，应当是影响近代中国人正确理解和认识体育的重要因素之一，包括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在内。

2 三育并重的体育思想

1901年蔡元培受聘担任上海南洋公学特别班总教习时，即重视三育并重的体育思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行为，是他积极地将教会学校中盛行的体育方法与手段移植到南洋公学，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早实施西方体育教育制度的官办学堂之一。1912年，在蔡元培所编的《中学修身教科书》中，更是列有专门体育章节，指出“凡道德以修己为本，而修己之道，又以体育为本。”认为若要“以尽人生之天职，其必自体育始矣。”^{[3]172}

蔡元培三育并重体育思想在《怎样才配做一个现代学生》的文章中，体现得最为完美。他说：“我国自来把读书的人叫做文人，本是因为他们所习的为文事的缘故，不料积久这‘文人’两个字和‘文弱的人’四个字竟发生了连带的关系。”使“一般读书人所应有的健康，大都被毁剥了。羸弱父母，那能生产康强的儿女！先天上既虞不足，而学校教育，又未能十分注意体格的训练，后天上也就大有缺陷。所以现时我国的男女青年的体格，虽略较二十年前的书生稍有进步，但比起东、西洋学生壮健活泼、生机勃勃的样子来，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计。”他认为：“先有健全的身体，然后有健全的事业，这句名言无论何人都是承认的，所以学生体力的增进，实在是今日办教育的生死关键。”而“欲求增进中国学生的体力，惟有提倡运动一法。”因此他特别强调现代学生要有“狮子样的体

力”。他对当时中国的学校体育现状很不满意。他批评说：“中国废科举，办学校，虽已历时二十余年之久”，然“对于体育一项的设备，太不注意。甚至一个学校连操场、球场都没有，至于健身房、游泳池等等关于体育上的设备，更说不上。运动机会既因无‘用武地’而减少，所以往往有聪慧勤学的学生，只因体力衰弱的缘故”，“不能出其所学贡献于社会。”^{[7]475}

因此他说，这样的现象一定要改变。因为“今日的学生，便是明日的社会中坚，国家柱石，这样病夫式或准病夫式的学生，焉能担得起异日社会国家的重责！又焉能与外国赳赳武夫的学生争长比短！就拿本年日本举行的第九届远东运动会而论，我国运动员的成绩比起日本来，几于处处落人之后。较可取巧的足球，日本学生已成我劲敌。至于最费体力的田径赛，则完全没有我国学生的地位，这又是何等可羞耻的事！”当然，他同时指出：“体力劳动的增进并非一蹴而企。试观东、西洋学生，自小学以至大学，无一日不在锻炼陶冶之中。所以他们的青年，无不嗜好运动，兴趣盎然。一闻赛球，群起而趋。这种习惯的养成，良非易事。而健全国民的基础，乃以确立。这种情形，在初入其国的，尝误认为一种狂癖；观察稍久，方知其影响国本之大。这是我们所应憬然猛省的。”^{[7]475}所以他说：“我希望现代的学生，一方面努力读书，一方面注意体育”，“如果专门读死书，而把身体弄坏，也不是正当的道理。”^{[8]362}他主张“自小学以至大学，无日不参加体育活动，以养成坚实的体力。”^{[8]490}

此外在体育的理论认识上，如果说以往更多的是囿于军国民意识，那么从1915年起，蔡元培也开始有了新的变化。在《1900年以来教育之进步》的文章中，他对体育作了新的注解：“体育者，循生理上自然发达之趋势，而以有规则之人工补助之，使不致有所偏倚。又恐体操之使人拘苦也，乃采取种种游戏之方法，以无违于体育之本意者为准。”^{[3]412}所以他特别称道当时南开的体育工作。“今之学校中，盖咸知重视体育者，但国人之情性甚深，致学生仍不得充量以提倡。贵校（指南开）连捷华北，体育已臻佳境。”他同时指出，“以体育之提倡，贵乎全体四万万中人。设尽四万人体育发达，余者仍颓唐故我，则全国体育依然列于软弱之类。”所以他希望南开能做到，“俾体育发达者不以是自满，且因之愈倡练习之风。而贵校体育号称发达者，大望始终勿怠，为国人倡焉。”^{[5]46}他充分肯定了南开体育成绩取得的不容易。他说：“以贵校体育论，跃高掷重，成绩昭然。然而练习之始，其难殆百倍于成功之日。”^{[5]49}

1917年，蔡元培又在《在浙江旅津公学演说词》

中说：“今之言新教育者，以体育、智育、德育并重，其功效胜于旧教育什百。以言体育，旧时习惯，偏重勤习，而于身体之有妨碍与否，皆所不顾，且以身体与灵魂为二物。人之智慧学术，皆由灵魂出，故重视灵魂，而轻视身体。今经科学发明，人之智慧学术，皆由人之脑质运用之力而出，故脑力盛则智力富，身体弱则脑力衰。新教育之所以注重体操运动，实基于此。”^{[5]58}认为三育并重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任何党派，都喜欢身体强健，无有以体健为不好者。”^{[6]56}这使他更加推崇“西洋教育，全身皆有训练，不单独注意脑部。既有体操发展全身的力量，又有图画和各种游戏，练习耳目手脚的活动能力。”^{[6]69}所以在他任北大校长时，规定学生的课程安排中要有“修身”内容。^{[5]143}而修身之大义，“则于卫生之道，勤勉诚实之行，皆能心知其意，而切实行之。”^{[5]146}当时北大的“校内，有个体育会，每个学生都交体育费，就是要人人都有运动的机会。”^{[6]183}1922年，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又要求说，虽然“年来大家对于体育都很注意。不过由学生自组的体育会，成绩还不很显著。从今年上半年起，渐改由学校组织。现分为学生军与体操两部。学生军一部，已请富军事智识的蒋百里先生担任导师；体操一部拟请由美洲新回来之周思忠先生担任。无论哪系学生，此两部中必须认定一部，作为必修的工课；均需用心练习，不能敷衍了事。”^{[6]264}他对北大学生在体育上的进步曾给予充分的鼓励和肯定。“一年以来，本校的学生，偶然与他校学生比赛，还有点成绩，有参加北京、华北、全国各种运动会的准备，特于今日先开一个校内春季运动会。我很信各同学必能利用运动会的长处，避去弱点。”^{[6]184}

1928年，蔡元培^{[7]234}在《全国教育会议闭会词》中，又提出学校不仅要做到“体育之特别注意，并注意于国技之应用”，表现了他对继承发展民族传统体育的关注。所以他对张之江在中国国术方面的贡献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张之江先生，国术大家也，为中国国术馆之发起人。游日本时，对于柔道及劈刺术与国术有密切关系者，观察特详。”他特别欣赏张之江“所注意者，不只是在国际运动大会中，见日本人游泳、野球、拳斗、长距离竞走等等之擅长，慨然于国术与各项运动之不可不兼习，足以见先生之博大。”^{[9]499}蔡元培对女子体育，亦给予了充分的注意。他说：“以为求国富强，人人宜受教育。既欲令人人受教育，自以女学为最重要之事。”所以他在爱国女学时，“有黄任之、刘季平诸先生任教课，崇尚柔术。”^{[3]302}在他最早设计的“女子普通学级表”中，亦坚持有体操课的安排^{[2]151}。蔡元培认为：体育的作用太多了，除健康身体以外，

它还可“养成勤务之习惯，而一切过激之动作，凌人之虚荣心，亦可以免矣。”^{[5]175}所以他在北京欧美同学会的工作中，也安排有“游艺”类的体育活动^{[5]159}。

3 运动会具有独到的教育作用

在不断提高对体育的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蔡元培对体育运动会形式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运动会的本身实有许多长处：第一，鼓励运动的兴会：人类的行为，不能专靠理智。在理智上我们固然知道运动的必要，但没有催发兴会的作用，或者鼓励不起来。鼓励的作用，就在运动会。不但喜欢运动的人借此加增高兴，不至厌倦；就是不大喜欢运动的人，受了刺激，也可以奋起一点。第二，加增校外同学的社交：一校的同学交换知识，联络感情，自然有很多机会，对于他校的学生就不容易了。偶然如辩论会、游艺会等，固然可以联合各校的学生，但此等机会，愈多愈好，运动会就是最重要的一种。第三，养成公德：团体的荣誉，就是个人的荣誉。宁正真而败，毋诡诈而胜。败则反求诸己，不怨尤，不嫉妒。但不是有许多机会渐渐涵养他，难免不因临时的冲动，阻碍理智的命令。英国牛津、剑桥两大学，用运动会的规则，养成自重急公的习惯，很有成效。我们承认，凡有运动会，都可以有这种成效的。”^{[6]164}

所以1921年，他还向太平洋教育会议提出了举办各国联合运动会的动议。他说：“运动会的利益，为教育家所公认的：(1)一时的优胜，全在平日预备，可以提倡体育；(2)个人即以团体的荣誉为荣誉，可以提倡公德；(3)一团体与他团体竞胜，宁正面而败，不肯枉道以取胜，可以矫正政党间或国际间以不正当手段达到一种目的的坏习惯；(4)败的但从自己方面再求进步着想，决不怨尤胜的，可以养成公平的思想与自勉的习惯。因有此等教育上的利益，所以中国古代，以射为普通教育中的一科。希腊人亦注重体操与竞技会。近世如英国牛津、剑桥两大学，尤励行运动会。各国也都有此等组织，并且逐渐推行到国际间。”^{[6]75}

他比较了中美两国人民对于运动的态度后说：“运动的高兴，中国所短。美国人无论男女老少，对于运动，都兴高采烈。不惟自己运动时如此，即看他人运动，如足球、棒球之类，亦觉极有兴趣。此美国人长处，不可不学。”^{[6]64}所以他在北大校长任上曾专门邀请东南大学著名体育教授麦克乐为北大学生进行体育的演讲^{[6]186}。他也曾对黄醒创办的《体育周报》有过很高的评价，认为“《体育周报》乃举各种工作，而说明其裨益体育之条件；以体育专家而注意及此，其必能为体育界开一新纪元，可无疑也。”^{[5]356}

当然，在充分肯定运动会对学生产生积极的示范和教育作用的同时，蔡元培也非常清楚地告诉人们：“见各校颇有因运动会竞胜之故，特标选手，牺牲一切学科，以专练踢球、跳高等技，为母校争体面者，甚感之，以为此决非提倡体育之本意。”^{[5]366}他说：“又如体育，本属很平常之事，应有健全之体格，方能从事各种事业，苟能了解此点，无不乐为的。乃竟盛行比赛运动，以为奖励体育，养成抑人我胜之观念，并且造成运动员阶级。”他认为这是很需要纠正的^{[5]396}。他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一文中指出：“在西洋有一句成语，叫做健全的精神，宿于健全的身体。足见体育的不可轻忽。不过体育是要发达学生的身体，振作学生的精神，并不是只在赌赛跑跳或开运动会博得名誉体面上头，其所以要比赛或开运动会，只是要引起研究体育的兴味，因恐平时提不起锻炼身体的精神，故不妨常和人家较量较量。我们比不过人家时，便要在平常用功了。其实体育最要紧的，是合于生理。”^{[5]374}

他反复强调：“学校的运动，并不以训练几个选手为目的，而以运动的普及为原则。”他说：“健全身体，实为教育上重要任务。健全的方法，运动最要。每种运动，对于身体有其特殊的效力；而种种规则，又可以养成勇、正直、服善、爱群诸美德。”^{[6]442}所以蔡元培对当时社会上一些变味的学校运动会，诸如“每校注意选手，不谋普及；这等选手专门运动，不必尽心于本分的功课；专以运动为竞胜的作用，毫不注意于身体的平均发展是否紧张过度，妨碍卫生”等现象，曾提出过严肃的批评。但是他又客观地说：“这些弱点，不是运动会本身的坏处，乃是提倡运动的人，要牺牲一部分运动员，去传播学校的虚荣的缘故。”他认为这样做的结果，“不但这一部分专门运动的被牺牲了，而且多数不配充选手的，反把运动的兴会都牺牲了。”因此他说：“我们不忍执行这种牺牲的手段，所以这几年来，不敢用‘揠苗助长’的方法来勉强提倡运动会。”^{[6]183}

他在《北大第二十二年开学式演说词》中明确地指出：“本校提倡体育会、音乐会、书画研究会等，”是为了“来涵养心灵”^{[5]344}。因此他对体育中的“选手制”做法，采取了坚决批判的态度。还在1915年时他就指出：“近日教育界乃称采奖励、竞胜等法，以为助长体育之作用，吾以为有害而无益。”一为生理之害。他说：“惟求以各以本身为标准，使不致过情而不及其格，过激而转损其躯，此体育之本义也。一涉竞胜，则人人以好胜之故，而为过激之运动，所伤实多。且各种游戏，各有其裨补于生理上一部分之特长，故以体育之本义衡之，当循环演习，而不宜有所偏重。一

涉竞胜,则人不能不择其可以制胜之技,而专门演习,则生理上一部分偏于发展,而其他部分不能与之适应,失体育之本义矣。”二为三育失去平衡。蔡元培说:“今于体育方面,特采奖励、竞胜之法,则生徒必缘此而于体育一方面为倍蓰之练习,而知、德各科,不免有所偏废矣。”三为心理之害。他说:“一涉竞争,则为对于人之关系。未竞之先,有希冀之心。既竞以后,胜者,于己为骄矜,于人为蔑视;负者,于己为愧怍,于人为忤忌。是皆心理上之恶德也。”因此他提出:“故吾以为体育必排除奖励及竞胜等种种助长之方法,而一以生理学为标准。”^{[3]412}

1936年,他在一次大学讲演中又再次指出:“以前的选手制,常犯了偏枯的毛病,根本失却了体育的本意。”那种体育的错误就是:“1)不平均——体育为少数人所专有;2)太偏重——部分选手则太偏于运动,牺牲了其他功课。”因此他说:“今后对于体育之认识,则为根据于卫生的知识,不一定要求其做国手。”所以他赞赏大夏大学“实行普及体育,学生自治会又在促进普及体育的成功”做法,“是可喜的。”^[4]当然他最后归纳说:“这么看来,运动会本身,本有许多长处;前几年吾国运动会的弱点,是由利用运动会的人制造出来,不是他本身的坏处。”^{[6]184}其对运动会形式的评说,既客观又准确。

蔡元培体育思想的形成,经历了长期的探索过程,并和当时的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一样,对体育的认识也曾经历了从注重体育的社会功能与作用,如倡导军国民体育,而逐渐向体育真义,即体育是为了锻炼身体和涵养心灵的回归。在蔡元培的体育思想中,始终坚

持一条主线,这就是教育。无论是倡导军国民体育,还是坚持三育并重的理念;无论是提议举办各国联合运动会,还是强调学校体育的普及原则。蔡元培始终是把体育作为教育人的手段来理解和认识的。作为思想家、教育家的蔡元培,亦表现了对体育的如此关注,说明体育在近代中国社会一度是非常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因此研究中国近代体育史,不仅是为了厘清体育发展的历史线索,更要注意它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影响。

参考文献:

- [1] 蔡建国. 蔡元培与近代中国(蔡尚思序)[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 [2] 蔡元培. 蔡元培全集: 第一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3] 蔡元培. 蔡元培全集: 第二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4] 蔡元培. 蔡元培全集: 第七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81.
- [5] 蔡元培. 蔡元培全集: 第三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6] 蔡元培. 蔡元培全集: 第四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7] 蔡元培. 蔡元培全集: 第五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8] 蔡元培. 蔡元培全集: 第六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编辑: 邓星华]